康熙朝御定书籍编刊机制研究*

杨 国 彭

内容摘要:康熙朝纂修御定书籍达102种之多,其编刊诸项事务悉由康熙帝亲加裁断。诸书纂修地点有内廷与官外之别;成书流程分为开馆筹备、编纂校刊及成书告竣三个阶段。其中书籍校对尤受重视,诸书或纂成全稿再陆续校刊,或纂成一部分即付校刊。凡由康熙帝亲率翰林校对之书,均设馆于内廷或委派李光地承修,并统一在武英殿校刊;而臣工承刊之书,或在官外设馆纂修,或承接内廷已成之稿,虽仍须呈送皇帝御览,但审校主要由南书房负责。在康熙帝的主导下,内府形成了完备而高效的御定书籍编刊机制,从而奠定了清代内府书籍出版制度的基础。

关键词:康熙朝 御定书籍 武英殿 南书房 编刊机制

引言

御定书籍,是中国古代由皇帝亲自裁定的官修书籍。清代称“御定”“钦定”“御纂”“御制”“御批”“御选”者,皆属此类,其编纂规格在官修书籍中等级最高。清代康熙年间,内府编纂并刊刻了大量御定书籍,内容详备,刻工精湛,时人即有“后世宝惜,必称曰‘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的高评价①。官修史籍盛赞康熙“御定诸书,包涵万有,融贯百家”②,民间则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故宫博物院藏康雍时期内府稿抄本整理与研究”(22CTQ004)阶段性成果。

①金埴:《不下带编》卷四,金埴撰,王湜华点校:《不下带编 巾箱说》,中华书局,1982年,第65页。

②胤禛:《圣祖仁皇帝实录序》,《圣祖实录》首卷一,《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御定诸书,纂辑详备,镂刻精工,更胜宋元,尽善尽美,可为一代大观”①。直至晚清犹有“当时钦定诸籍,其雕本尤极精良”②之誉。这些跨越百余年的赞誉,不仅印证了康熙朝御定书籍极高的编刊水准,更彰显其作为宋元之后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又一座高峰的历史地位。

康熙朝内府刻书久负盛名,因此,以刻书为视角的研究开展得较早。早在20世纪初,陶湘就指出康熙朝刻书“极工”,并简述了康熙间内府铜活字印书以及扬州诗局刻《全唐诗》的史实③,堪称康熙朝内府刻书研究的开山之作;80年代以后,研究进入一个高潮,以谢国桢、吴哲夫、金良年、李致忠为代表的学者,系统探究了武英殿刻书始末,并揭示了扬州诗局及臣工刻书等现象④,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21世纪以来,以曹红军、翁连溪、项旋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推进清代内府刻书的研究,使康熙朝御定书籍刻本的数量和特色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呈现⑤。以刻书为视角的相关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充分彰显了康熙朝内府刻书在古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亦有学者突破单一刻书视野,着眼于书籍从编纂到刊刻的完整过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杨玉良就系统考察了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运作关系⑥,是研究康熙朝内府书籍编刊问题的重要

---

①朱象贤:《闻见偶录》,张潮、杨复吉、沈楙悳等编纂:《昭代丛书》第2册《庚集埤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89页。

②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一,朱彭寿撰,何双生点校:《旧典备征　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第166页。

③陶湘:《清代殿板书始末记》,陶湘编,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④谢国桢:《从清武英殿版谈到扬州诗局的刻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第15—18页。吴哲夫:《武英殿本图书》,《故宫文物月刊》总第20期(1984年),第94—98页。吴哲夫:《清代殿本图书》,《故宫文物月刊》总第28期(1985年),第132—137页。金良年:《清代武英殿刻书述略》,《文史》第三十一辑,中华书局,1988年,第183—208页。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第七章《清代刻书述略》,巴蜀书社,1990年,第290—297页。

⑤曹红军:《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赵生群指导),2006年,第20—69页。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48—75页。项旋:《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2—91页。

⑥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1期,第28—40页。

参考;进入21世纪,以潘志和、魏明政为代表的学者,从编书角度探讨了康熙朝御定书籍数量问题,并重点关注康熙帝亲自参与纂书的史实①。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相关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王文欣利用《匏庐公日记》还原了康熙朝钦定书籍编刊过程中参与人员的组织动员、私人力量的吸纳以及皇帝的作用等诸多细节②;甄芸从文化导向、人才储备、文献积累及完善出版等多方面分析了康熙朝官修书籍编刊兴盛的原因③;郭康松、李明欣考察了康熙南巡简拔举贡生监参与御制文献编纂的始末④。这些成果为全面把握康熙朝御定书籍的编刊历史提供了有益启发。

中国古代书籍的编纂与刊刻具有内在的连续性,编纂为刊刻提供内容基础,刊刻则是编纂成果的最终呈现,二者构成统一的整体。现有研究虽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对康熙朝御定书籍的认识,但对于书籍从文本编纂到校刊成书的完整出版流程尚缺乏系统性考察。康熙朝作为清代内府书籍出版制度创立的关键时期,其御定书籍的编刊运作模式对于揭示该制度的形成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史料记载,力图呈现康熙朝御定书籍从编纂到校刊的整体成书过程。

一、康熙朝御定书籍的数量与分类

研究康熙朝御定书籍,首要任务在于厘清其具体数量。由于诸书的成书情况复杂,后人统计标准往往不一,形成的结果亦存在差异。如《国朝宫史》列出康熙朝钦定编纂或重订之书共74种⑤,光绪朝《钦定大清会

①潘志和:《作为图书总编辑的康熙》,《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2期,第95—97页。魏明政:《清康熙朝御制文献之研究》,淡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高柏园指导),2014年。

②王文欣:《由〈匏庐公日记〉看康熙朝中后期的钦定书纂刻事业》,《文献》2023年第1期,第153—168页。

③甄芸:《文治与修书:康熙朝官修书籍编刊兴盛成因考探》,《图书馆学刊》2023年第6期,第81—85页。

④郭康松、李明欣:《康熙南巡简拔举贡生监与御制文献的编纂及影响》,《清史研究》2024年第6期,第102—114页。

⑤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二二至三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86—668页。

典事例》记载康熙帝敕命翰林院编纂书籍 43 种①。魏明政统计康熙朝御制书籍为 67 种②;潘志和统计康熙朝御编书籍共 73 种③;翁连溪列出康熙朝内府刻书 123 种④,这一统计数量最多,但内府刻书与御定书籍实属两个不同范畴。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出三条计数原则:一是同一部书有满、汉等多版本者仍计为一种;二是内容非康熙帝御定者,如武英殿仿宋刻本及御笔佛道经册等不予计入;三是《时宪历》等历年奉旨编纂颁行之书,仅列为一种。依此标准,经系统爬梳各类史料,统计出康熙朝御定书籍 102 种(详见下文)。

在分类方法上,本文按照刊行情况将康熙朝御定书籍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已刊之书,即完成编纂并在康熙朝付梓者;二是未刊之书,即奉旨纂修但未在康熙朝刊成者。

(一)已刊之书

1. 武英殿刻本

康熙十九年(1680),武英殿设造办处⑤,专门刊刻内府书籍。就目前所见史料记载来看,康熙五十年以前明确为武英殿所刊的御定书籍,有《古文渊鉴》《清文资治通鉴纲目》《御制清文鉴》《清文合蒙古鉴》《御制耕织图诗》5 种⑥。此后武英殿刻书数量迅速增加,其显著特征是卷前或卷尾职名中刊列"监造官"或"武英殿监造"一项,诸如《佩文韵府》《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御选唐诗》《御纂朱子全书》《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月令辑要》《韵府拾遗》《分类字锦》9 种均是如此。卷帙较

①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九,《大清会典》第 23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 年,第 17551—17556 页。

②魏明政:《清康熙朝御制文献之研究》,第 1 页。

③潘志和:《作为图书总编辑的康熙》,《出版发行研究》2012 年第 12 期,第 96 页。

④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第 370—386 页。

⑤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七三,《大清会典》第 24 册,第 18793 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979 号《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进书并请增印古文渊鉴等书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59 页。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三一,第 610 页。《御制耕织图诗》末图有"鸿胪寺序班臣朱圭镌"(《续修四库全书》第 97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04 页),可知此书为武英殿所刊。

少之书，如康熙五十三年所刻《佩文诗韵》①以及六十一年刻成的《御制千叟宴诗》②则未署监造官职名。

2. 臣工刻本

自康熙四十二年之后，臣工承刻的御定书籍数量迅速增多，达 28 种。除《渊鉴类函》《御制诗第三集》外，各书内均有署名，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是卷前职名开列校刊者衔名。如康熙四十三年刻成的《皇舆表》，校刊官是宋荦、高舆；康熙四十五年刻成的《全唐诗》，校刊官为曹寅；康熙四十六年刻成的《佩文斋书画谱》，校刊官署王世绳等六人；康熙四十八年刻成的《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校刊官为王景曾；康熙五十一年刻成的《御定历代纪事年表》，校刊官为马豫；康熙五十五年刻成的《康熙字典》，纂修兼校刊官是陈世倌；康熙五十六年刻成的《万寿盛典初集》，校刊官署赵弘灿、赵弘燮及赵之垣三人；康熙六十年刻成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校刊官为赵之垣。

二是卷端次行署校刊者衔名。如康熙四十二年所刊《御制诗集》两集，卷端均署宋荦校刊；康熙四十五年所刊《御定全唐诗录》署徐倬及徐元正校刊；康熙四十六年所刊《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署陈邦彦校刊，《读书记数略》署宫梦仁刊刻，《御选历代诗余》署王奕清校刊。

三是卷尾有校刊者衔名。如刻于康熙四十六年的《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署宋荦校刊；刻于康熙五十三年的《御制文集》三集均署蒋陈锡、蒋涟校刊；刻于康熙六十一年的《钦定篆文六经四书》署张照、薄海校刊。

四是卷前序文或进呈表中载有校刊者信息。如康熙四十五年刊《历代赋汇》，卷前“进呈表”载陈元龙承敕编刻；康熙四十七年刊《佩文斋广群芳谱》，“进呈表”称刘灏奉旨校刊；康熙四十六年刊《佩文斋咏物诗选》，“进呈表”记高舆承敕校刻；康熙五十年刊《御定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前有郭元釪奏折，言及此书系康熙帝赐以刊正；同年刊《幸鲁盛典》亦于“进表”中称孔毓圻承旨编刻；康熙五十二年刊《诸史提要》，卷前序文载张廷玉刊刻此书。

此外，未在书内署校刊者之名的《渊鉴类函》和《御制诗第三集》，分

①《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439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印刷〈诗韵〉十部等折》，第 955 页。

②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391—392 页。

别为高舆和李煦所校刊。又有《绎史》一部,为马骕所著,并“钦定取入内府”①,此书在进呈前即已刊行。

3. 翰林院所刊之书

康熙十九年刊行的《日讲书经解义》卷首有翰林院掌院学士库勒纳、叶方蔼的“进呈疏”,内载康熙帝旨:“尔衙门《四书讲章》刊完,可即将《书经讲章》刊刻。”②随后翰林院又奉旨刊刻《日讲易经解义》。可知此 3 种经学讲章均为翰林院所刊。

4. 刊刻者待考之书

康熙间刊行的《刑部现行则例》《孝经衍义》《大清会典》《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清凉山新志》《历朝闺雅》《曲谱》7 种书,因缺乏明确的史料证据,其具体刊刻者或机构尚待进一步确定。

(二)未刊之书

康熙朝有大量御定书籍未在本朝刊成,可分为三类:一是内府向不发刻之书,主要是重大的朝政典籍,如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圣训》以及皇室族谱《玉牒》等;二是未能成编者,以《大清一统志》为代表,全书自康熙二十四年开始纂修,终康熙一朝未能纂成全编,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抄本问世③;三是成编后未及刊成者,如《御制律历渊源》于康熙六十一年纂成,因康熙帝去世未能在本朝全部刊成。此三类御定书籍数量众多,其中经部 6 种,分别为《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日讲礼记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诗经解义》《翻译大学衍义》《清汉文小学》;史部 22 种,除三朝《实录》《圣训》及《玉牒》《大清一统志》外,还包括《顺治大训》《三朝国史》《明史》《平定三逆方略》《平定罗刹方略》《治河方略》《大政统纪》《政治典训》《省方盛典》《鉴古辑览》《通鉴讲章》《钦定方舆路程考略》《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简明赋役全书》;子部 18 种,分别为《御制律历渊源》《律吕纂要》《鸟兽虫鱼广义》《钦定格体全录》《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子史精华》《骈字类编》《御定奇门真诠》《御定奇门宝鉴》《御定六壬直指》《御定六壬金口合占》《御定卜筮精蕴》《御定五星精义》《御定子平集

①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二八,第 584—585 页。

②库勒纳等编:《日讲书经解义》卷首《日讲书经解义进呈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2 页。

③杨国彭:《故宫藏两种康熙内府抄本〈大清一统志〉考辨》,《中国地方志》2023 年第 5 期,第 48—57 页。

要》《音韵阐微》《御定星历考原》《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万年书》《灵台仪象志》;集部包括《御制文第四集》《清文颖》2 种。这些书籍的存在,展现了康熙朝官修书籍规模的宏大,亦反映了编刊工作的复杂性。

二、康熙朝御定书籍的纂修地点

(一)内廷纂修

御定书籍的纂修处主要集中于内廷。其中,南书房是康熙间最主要的修书之处。如康熙十七年,康熙帝两次召陈廷敬等人至南书房编纂①;叶方蔼入值南书房期间总裁《皇舆表》《鉴古辑览》②;徐乾学入值南书房后,奉敕编注《古文渊鉴》③;《佩文韵府》在武英殿正式开局之前,先由南书房翰林等辑成一编④。自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武英殿开局纂修《佩文韵府》后,翰林常年入殿修书,武英殿亦成为内府重要修书处。除此之外,康熙九年置起居注馆于太和门外西廊;康熙三十年,内廷设立书局翻译《资治通鉴纲目》⑤,其位置在隆宗门附近,名为内翻书房⑥;南薰殿则于康熙四十三年开设《钦定方舆路程考略》书局⑦。这些书馆均位于宫内。畅春园作为康熙帝日常起居理政之处,规格视同内廷,园内亦设馆修书,如开设于蒙养斋的算学馆即是一例。

部分御定书籍可通过史料记载确证其为内廷纂修的性质。《御制诗集》⑧、《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作为康熙帝御著,其辑录整理均在内廷;康

---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1 册,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59、375 页。

②金吴澜等修:《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二四,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索书号:地 220.187/39),叶三十一。

③徐乾学:《憺园文集》卷十九《御选古文渊鉴后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2 册,第 551—552 页。

④查慎行:《敬业堂文集》卷一《佩文韵府告成公请御制序文奏折(拟稿)》,查慎行著,范道济点校:《查慎行全集》第 7 册,中华书局,2017 年,第 35—36 页。

⑤《圣祖实录》卷一五〇"康熙三十年二月",《清实录》第 5 册,第 665—666 页。

⑥赵志强:《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22—28 页。

⑦顾嗣立:《春树闲钞》卷上,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六集》第 7 册,文海出版社,1969 年,第 432 页。

⑧《御制诗集》由高士奇"久侍讲帏,与叨编缉"(高士奇、宋荦:《进表》,《清圣祖御制诗初集》卷首,《故宫珍本丛刊》第 542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14 页)。

熙四十九年《康熙字典》开纂前，南书房大臣提议“此书或止用里边人，或再派翰林几人帮修，以便速成”①，所谓“里边人”，就是指内廷翰林；康熙五十三年，和素奏请在《月令辑要》书名前添写“钦定”二字，康熙帝批示“皆系内廷所修之书，不必添”②。循此规律可发现，书名中同无“钦定”等字的《皇舆表》《渊鉴类函》等书亦系内廷所修，其中《皇舆表》于康熙十八年成书，至康熙四十二年宋荦校刊时，内容需予以补正，遂开局于翰林院增修③。

值得注意的是，经康熙帝同意后，纂修者可将书稿带回家中编纂。如苏州知府陈鹏年奉旨“仍以方舆书随纂”④，所指即《钦定方舆路程考略》；王兰生参与纂修《音韵阐微》时亦“有旨命韵书带回，就家纂辑”⑤。这种灵活的纂修方式，保证诸书能按时完成。

（二）宫外纂修

宫廷之外的修书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为臣工个人所纂，如康熙四十二年徐倬进献个人所著《全唐诗录》，获得御定⑥；康熙四十三年，康熙帝将《历代赋汇》抄本发还给著者陈元龙，命其携归家中增益校对⑦；署名陈邦彦校刊的《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由查慎行居家时编定初稿，陈元龙增补⑧。此类书籍均由臣工个人完成，进呈后遂成为御定之书。

其二是专门开馆纂修之书，合众人之力而成。康熙十二年《翻译大学衍义》书成，翰林院掌院学士传达礼称“编纂书籍，臣衙门职分当

---

①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1册，第575页。

②《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439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印刷〈诗韵〉十部等折》，第955页。

③喇沙里等：《皇舆表》卷首《增修上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叶三。

④李果：《在亭丛稿》卷六《陈恪勤公传》，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索书号：A03154），叶二十四。

⑤法式善：《槐厅载笔》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377页。

⑥陈廷敬：《御定全唐诗录后序》，徐倬辑：《御定全唐诗录》卷末，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武英殿刊本（索书号：241339 247977），叶二。

⑦陈元龙：《爱日堂诗》卷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

⑧王文欣：《〈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编纂刊刻过程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6期，第83—89页。

然”①,证明此书实纂于翰林院;康熙十八年,《明史》设馆于东华门左②;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佩文斋广群芳谱》《御选历代诗余》《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三馆俱令在外开局”③,指的即是在内廷之外开馆,其中《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设馆于原任大学士王熙的怡园④;康熙五十四年《春秋传说汇纂》亦在内廷外设馆纂修⑤,地点在总裁王掞家中;《御纂朱子全书》主要由李光地纂修⑥,康熙五十年书稿完成后又在李光地家校勘⑦;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御纂周易折中》由李光地奉命“即家开局”⑧,随即又在家开馆纂成《御纂性理精义》⑨。

康熙朝御定书籍纂修地点具有鲜明的分布特点。内廷修书之处如南书房、内翻书房均毗邻康熙帝的寝宫乾清宫,畅春园的蒙养斋亦紧邻康熙帝办公及起居之所澹宁居、清溪书屋等,由此确保书籍编纂过程中皇帝能够及时审阅。而武英殿和南薰殿开设的书馆,与负责刻书的武英殿造办处紧密相连,实现了从编纂到校刊的无缝衔接。随着康熙中后期开馆数

---

①《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2页。

②李澄中:《户部主事王君墓志铭》,《卧象山房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0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08页。

③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年谱》,《丛书集成续编》第3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812页。

④怡园位于京城横街西七间楼,是大学士王熙的园林(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730册,第458页)。

⑤张大受:《匠门书屋文集》卷二六《四川叙州府同知前翰林院庶吉士牟山李君墓志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2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63—764页。

⑥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三二《与孝感熊先生商酌朱子书名目次第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第444页。

⑦《圣祖实录》卷二四六“康熙五十年四月”,《清实录》第6册,第438页。

⑧王琐龄:《世恩堂诗集》卷二八《二月三日安溪李相国招同刘益侯总宪汤西崖少宰阮于岳少司空集诗牌字各赋五言律一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册,齐鲁书社,2001年,第308页。按,该诗作于康熙五十三年二月三日,李光地于五十三年休致获允,八月陛辞,九月出京(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三一《报到家日期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第432页)。《周易折中》开局时李光地尚未休致,地点在他的京城寓所。

⑨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二九《进性理精义学类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第408—409页。李光地在文中称“臣虽蒙恩准告归,然此书一处未稳,臣一日未敢行,不敢苟简以图完编”,可知《性理精义》仍于其京城家中纂修成稿。

量增加,部分书籍交由臣下在各自府邸承纂,既解决了场地限制,又能充分利用臣工的人力物力资源。这种空间布局反映出不同书籍的规格差异,亦彰显了康熙帝对编刊效率与质量的追求。

三、康熙朝御定书籍的编刊流程

中国古代中央机构纂修书籍具有一定的制度规范,宋人称“国朝以来,凡曰修书,必命使以提其纲,必设局以专其事,必有笔吏以课其程”①。这一修书原则,在明清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朝廷先设书馆或书局,置总裁、纂修、校对、缮写等职,经过编纂、刊刻、校对等程序,乃印成书。康熙时期,因御定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差异,各书的编刊过程多有所不同,结合史料记载,可归纳出具有规律性的运作模式。

(一)开馆筹备阶段

1. 请旨纂修

御定诸书的编纂须请旨获允后方可启动,但康熙帝本人往往是纂修动议的发起者,亦有臣下拟定书目请旨编纂的情况,王文欣对此已有分析②,兹不赘述。书籍编纂悉由康熙帝裁定,体现出其个人的学术旨趣与知识取向。

2. 组织团队

(1)总裁官。总裁官及监修官是修书事务的主持者,凡编纂重要典籍,此职均由大学士充任。《大清会典》载:“凡纂修《实录》《圣训》,大学士充监修总裁并总裁官,各给敕书。学士充副总裁官,俱题请钦定……凡纂修《典训》《方略》《会典》《明史》等书,俱如前例。”③康熙六十一年,内阁大学士马齐等奏称:

> 臣等查得从前各馆满汉总裁、副总裁缺出,俱具题兼管。康熙三十一年,将满学士请补副总裁。具奏。奉旨:“嗣后副总裁缺出,不必具题,着学士等俱于修书处行走。钦此。”凡满副总裁缺出,酌量

①《淳熙七年七月十三日敕通直郎秘书省秘书郎兼权礼部郎官范仲艺札子》,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清蒋氏宝彝堂抄本(索书号:09357),叶三。

②王文欣:《由〈匏庐公日记〉看康熙朝中后期的钦定书纂刻事业》,《文献》2023 年第 1 期,第 163 页。

③伊桑阿等纂修:《大清会典》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内府刻本(索书号:A03567),叶二至叶三。

将学士兼管，汉副总裁缺出，仍将臣等衙门、翰林院、詹事府各官开列，请旨兼管。今《省方盛典》馆行走之学士阿克敦、张廷玉俱升侍郎，但交伊等所修之书，尚未告成，着阿克敦、张廷玉仍兼副总裁。又查得大学士俱于各修书处兼管总裁、监修，《省方盛典》馆业奉特旨着马齐、王掞、王鸿绪总裁，不必另令大臣兼管外，请将大学士王顼龄补授。《三朝国史》《政治典训》《一统志》馆总裁、《明史》馆监修，俟命下，照例给与敕书，为此谨奏。请旨。①

正副总裁官的任命均由康熙帝钦定，自康熙三十一年后，该制度呈现出满汉差异化的特点，当满副总裁官出现缺额时，改由学士直接兼管，无需另行题奏；而汉副总裁官的任命，仍需由各衙门开列名单请旨定夺，这种安排反映出康熙帝对汉人主持修书事务的谨慎态度。此外，参与修书的官员升迁后，仍需兼任原修书职务，由此确保修书工作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侍读学士等中层文官亦可担任总裁官，如《日讲四书解义》总裁官为翰林侍读学士库勒纳、叶方蔼。至康熙后期，随着修书规模扩大，职位较低者如革职官员陈鹏年②、“白衣”方苞③、庶吉士王兰生④等均曾担任武英殿总裁，展现出康熙朝内府修书用人制度的不拘一格。需指出的是，康熙后期“总裁”职名的开列须由康熙帝钦定，如李光地在《御纂周易折中》中原被列为“承修”，后经康熙帝特旨改为“总裁”⑤。自康熙四十三年以降，御定诸书多被视为康熙帝亲自裁定，因此，除特别谕旨外，各书主持者通常以“总阅”“汇阅”“承修”等署名，而职级较低的主持者则署为纂修官列名于首。严格的职名刊载方式，彰显出康熙帝对御定书籍编纂的绝对主导权。

（2）纂修人员。纂修人员是修书工作的主力，需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谕“詹事府衙门与翰林院同属纂修书籍之处，

①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上册，广陵书社，2007年，第85页。标点略有改动。

②李果：《在亭丛稿》卷六《陈恪勤公传》，叶二十五。

③李元度纂：《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四《方望溪侍郎事略》，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间山东官印书局铅印本（索书号：123406），叶七十七。

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七《王少司寇荣遇》，陈康祺撰，晋石点校：《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145页。

⑤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二九《谢周易折中列衔改承修为总裁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第407页。

应将学问淹通之人补用”①,明确了翰詹词臣作为修书核心力量的地位。在人员构成上,《实录》《圣训》等重要典籍的纂修官由翰詹等中层文官充任,监修、总裁等拟定具题②。康熙朝还通过科举途径选拔人才入馆修书,康熙十七年,朝廷开科拔选博学鸿儒入《明史》馆修书,其中有朱彝尊、毛奇龄等一批饱学之士③;康熙五十一年,拔壬辰科进士“素有名者”十七人入武英殿纂修④。至康熙后期,为推进诸书纂修进程,朝廷进一步扩大选才范围,一批水平较高的贡举监生亦获选参与编纂。如精于算学、乐律的举人顾陈垿被荐入湛凝斋修算书;精于诗词的举人顾嗣立至京中分纂《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选》;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下旨考试学习算法之士人,其中“学习优者”入蒙养斋书馆修书⑤。康熙朝通过灵活而广泛的选才机制,不仅保证了御定书籍按时完成纂修,亦确保各书的内容质量。

(3)校对人员。康熙一朝,上至阁部大臣,下至贡举监生,均参与书籍校对。从各书刊载的职名来看,主要分为各书馆校对、南书房校对、武英殿校对以及承刊者校对等不同层级。一些关系重大的经学书或深奥的数理之书还列有御前校对,如《御纂周易折中》御前校对魏廷珍自谓“当日备员内廷,躬充校对,亲炙圣祖仁皇帝”⑥。总裁级别的大臣亦亲自校书,王鸿绪分修《佩文韵府》时与诸臣“公同照前校阅,间有字句误写者,臣等看出,即行改正”⑦;李光地在《御纂朱子全书》初稿完成后,复对全书从头校对,“倘有重复参错之处,即改正抽换”⑧。康熙帝曾言:“一部

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149页。

②伊桑阿等纂修:《大清会典》卷二,叶三;卷一五五,叶四、十九。

③《圣祖实录》卷八十“康熙十八年三月”,《清实录》第4册,第1023页。

④顾陈垿:《抱桐轩文集》卷三《进士吴君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1册,第415页。

⑤《圣祖实录》卷二五六“康熙五十二年九月”,《清实录》第6册,第531—532页。

⑥胤禛等:《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四九上《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江南安徽巡抚臣魏廷珍谨奏为恭谢天恩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2册,第537页。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052页。

⑧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二九《进乐律琴律图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第417页。

成型好书内,若有错字,算何规矩,详校之。”①庞大的校书群体以及繁复的校对程序,足见康熙帝对书籍质量要求之严。

(4)缮写人员。缮写是御定书籍成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呈现书籍的字体面貌。国子监监生是缮写的基本力量,《大清会典》载,“凡缮写编纂书籍,请旨移咨国子监,考取善书监生缮写”②。康熙中后期,随着开纂书籍数量增多,内廷供奉人员已难以满足缮写需要,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两次南巡期间,康熙帝特旨选拔南方各省举贡生监进入内廷抄写,内府缮写力量因之大增。

康熙帝对书籍字体的要求颇高,《全唐诗》在扬州诗局校刊时,曹寅专门命书写人员“习成一家”,为此不惜迟误一年开展写刻工作③,可见御定书籍用字之严。各馆均择书法尤佳者充任缮写,如《佩文韵府》编纂时,查慎行奉旨选拔“各馆上写字好者”缮写④;《万寿盛典初集》纂修时,王原祁亦奉旨选用“新进士字好的”抄书⑤。受此影响,康熙间一批书法名家被选入宫中抄书,如缮写名手林佶于康熙四十五年入武英殿抄书⑥;南书房翰林查昇之婿沈元沧被康熙帝称为“书法与其外舅正同”⑦,亦被征召入内。除选拔外,康熙间还有一批抄书匠受雇参与缮写,如武英殿总监造李国屏曾雇“宋字人”抄书⑧,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时专门“领银雇人缮写”⑨,王鸿绪编纂《佩文韵府》时与李振裕、汪霦等臣僚雇

---

①《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324号《胤祉奏呈改完之〈几何原本〉第三卷折》,第918—919页。

②伊桑阿等纂修:《大清会典》卷一五五,叶十一。

③《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第179页。

④查慎行:《敬业堂文集》卷一《武英书局报竣奏折》,查慎行著,范道济点校:《查慎行全集》第7册,第34页。

⑤王原祁:康熙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折,王原祁等:《万寿盛典初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3册,第7页。

⑥林佶:《朴学斋诗稿》补编《献赋始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2册,第131页。

⑦李放:《皇清书史》卷二六,《丛书集成续编》第9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590页。

⑧《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1047页。

⑨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二,《松鹤山房诗集　松鹤山房文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铜活字印本(索书号:A03042),叶五。

人抄写书稿①。广泛的缮写群体与严格的选拔要求,共同保证了御定诸书的高效完成,并使其字体保持极高的水准。

3. 编定凡例、撰写样本

御定各书纂修前,例由总裁拟定凡例并撰写样本,经御览获准后方可正式开纂。康熙五十三年,康熙帝谕称《鸟兽虫鱼广义》一书"杨开(沅)奏览样本之书、则例亦好,将此交付汪灏、陈鹏年编修可也"②。臣下亦可代为审定,《万寿盛典初集》凡例即由南书房翰林奉旨详议③。对于重要的经学著作,凡例的审定尤为谨慎,李光地承修《御纂性理精义》时,先拟凡例七条进呈,康熙帝"逐条改正",李光地遂"奉为科律"开展编纂④;《御纂周易折中》编纂前,李光地原拟凡例第五条有"空言义理"四字,经康熙帝御笔改为"专言义理"⑤,这一细微改动,充分体现康熙帝对经学之书的重视。当凡例存在不足时,康熙帝则命经验丰富的臣下复议,如《子史精华》样本及凡例进呈后,康熙帝认为"此书甚大,究竟恐怕将来不讨好的",遂命大学士再加阅看⑥。严格的凡例审定制度,为正式纂修奠定了基础。

4. 钦定书名

御定书籍的命名均由康熙帝亲自裁定。《佩文韵府》于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赐名⑦,《渊鉴类函》亦由"帝锡嘉名"⑧。部分书籍由臣下拟名并请旨裁定,《性理精义》纂修前,李光地拟出《性理精义》《性理粹言》两个书名,请康熙帝点定⑨;《康熙字典》纂修前,南书房大臣拟出《康

①《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8 册,第 1051 页。

②《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478 号《李国屏奏请将武英殿房拨给编书折》,第 967 页。

③王原祁: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折,王原祁等:《万寿盛典初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3 册,第 7 页。

④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二九《进性理精义凡例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60 册,第 407 页。

⑤《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6 册,第 120 页。《凡例》,《御纂周易折中》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 册,第 13 页。

⑥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354—355 页。

⑦查慎行:《南斋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164 页。

⑧张英等:《进呈类函表》,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82 册,第 4 页。

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6 册,第 735—736 页。

熙字典》《康熙字范》《钦定字学》三个书名呈请裁定①。此外,一些书籍在纂修过程中还有更名的情况,如《钦定方舆路程考略》更名为《钦定皇舆全览》②,《月令广义》更名为《月令辑要》③,《对类书》更名为《分类字锦》④,均出自康熙帝旨意。

(二)编纂校刊阶段

康熙朝御定书籍编刊模式有两种,其一为纂校成全稿后再校刊成书;其二为编纂校刊同步推进。

1. 先纂校成全稿再校刊成书

御定书籍通常先纂校成全稿,再进行校刊。以《御纂朱子全书》为例,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帝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承修此书⑤。因熊赐履于该年致仕回籍⑥,二人合稿后,主要由李光地进呈。据陈邦彦日记载,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安溪来进《朱子书》四卷,发下直房校阅";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九日"李安溪进《朱子书》,发直房校对"⑦。陈邦彦是入值南书房的翰林,因此"直房"是指南书房,"安溪"即李光地。李光地的记载与之相印证:"本月初二日,南书房发出《朱子书》一封,御笔批'此书送南书房,交大学士李光地,钦此'。臣祇领检读,已钦遵指示改正讫,所有缮就第十二卷至第十四卷,谨送交南书房进呈。"⑧可知李光地每纂成数卷即由南书房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发下南书房校对,或通过南书房发回李光地改正。至康熙四十九年,全书初稿纂为八十三卷⑨。康

①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574—575 页。

②陈力:《新出〈钦定皇舆全览〉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1 期,第 105 页。

③《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403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进〈月令广义〉一本等折》,第 944 页;第 2439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印刷〈诗韵〉十部等折》,第 955 页。

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3440 号《李国屏奏明误缮书名之缘由折》,第 1417 页。

⑤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226 页。

⑥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十一《故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文端公事状》,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71 页。

⑦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336、381 页。

⑧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二八《条奏朱子全书目录次第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60 册,第 390 页。

⑨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二八《进校完朱子全书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60 册,第 393 页。

熙五十二年,该书开始在武英殿校刊①,各篇先经翰林张起麟、徐用锡及举人成文三人校对,由李光地等人阅看后进呈②,康熙帝御览后发下武英殿陆续刊刻,有讹误则即时改正,以此汇订成卷③。至五十三年六月,该书御制序开始刊刻④,说明各卷已近刻成,全书最终刊定为六十六卷。

御定之书成稿之后也有并未立即发刻的情况,如《渊鉴类函》纂成于康熙四十年⑤,至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揆叙将此书写本进呈,康熙帝命南书房"着月内先对几本,交高舆刊刻,余陆续校对发去可也",该书遂开始付校发刊;三日后,南书房"先缴校完《渊鉴类函》二套,上即封发平湖刊刻","平湖"即指嘉兴平湖人高舆;三个月后,新刻第一卷样本呈送康熙帝御览,他命大学士陈廷敬、尚书王鸿绪阅看,二人点评"《渊鉴类函》样本写刻精工,以后应照此逐卷校刻"⑥,全书遂按此方式校刻,至康熙四十九年全书告竣。

以上书籍均由书馆编纂并陆续进呈御览,逐渐汇成全稿,再由武英殿或南书房翰林分批校对,陆续发给武英殿或承刊人刊刻。期间校刊完成的各卷,也次第进览,再汇订成书。

2. 编纂校刊同步推进

御定书籍的另一种成书模式是每纂成一部分即付校刊。最具代表性

---

①《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116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已刷印〈朱子全书〉九篇折》,第 852 页。

②《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126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报刻完〈朱子全书〉十九篇折》,第 855 页。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后,南书房翰林蒋廷锡、杨名时等人亦参与阅看(《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313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李光地具奏篇子折》,第 916 页;第 2358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对完〈朱子全书〉十四篇一本等折》,第 930 页)。

③《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275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已粗订〈朱子全书〉一卷折》,第 902 页。

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434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众臣盛赞御纂〈朱子全书〉之〈序〉等情折》,第 953 页。按,《御制朱子全书序》的落款时间为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应是撰写时间,实际刻成时间在康熙五十三年六月间。

⑤张英等:《进呈类函表》,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82 册,第 4 页。

⑥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353—354、356、389—390 页。

的当属《佩文韵府》,此书始纂于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先由南书房翰林在《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书基础上增补订正①,渐成一编,阁部大臣再加搜讨,又成一编。是年十二月开局于武英殿,由入值翰林将两编合纂。武英殿总监造逐日将各篇进览,康熙帝阅毕即发回武英殿刊刻,如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赫世亨进"翰林等所编一先三字二十三篇",康熙帝览后于十七日发回,武英殿刻成书样后仍进呈御览,康熙四十五年六月赫世亨奏进"新刊印十二文二卷",七月进"已刷印之十三元二卷",至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刊印成的各卷已可"装订成套"②。全书于康熙五十年十月告竣。

《佩文韵府》刊成后,武英殿并未闭馆。康熙五十一年,《御选唐诗》开始纂注,是年二月间,武英殿总监造进呈各篇均为大学士陈廷敬所送,四月陈廷敬去世后,武英殿翰林吴廷桢等接续纂注;纂注成篇后由陈邦彦等人缮写进呈,待"上改定后,复恭缮刊刻"③,刻样仍进览。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和素奏称"《御选唐诗》皆已刻完,序亦近刻完。惟补编、目录,南书房翰林尚未校完,六月间一定能完"④,可知《御选唐诗》刻完后经南书房翰林校对才算告竣⑤。

《佩文韵府》和《御选唐诗》均以"篇"为单位进呈御览,亦有书籍以"本"为单位进呈。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开馆纂修的《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署名王景曾校刊。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宋诗选"首先纂成,由书馆进呈康熙帝御览后,发交南书房校对,王景曾随即请刊。十一月二十七日,

---

①相关研究,详参本期张升《〈佩文韵府〉仿何书而编》一文。

②《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25号《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进书折》,第440页;第890号《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进书折》,第426页;第933号《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进刷印样书折》,第444页;第1433号《李国屏进书并报〈佩文韵府〉已装订成套折》,第624页。

③《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857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闻〈御选唐诗〉注释四篇折》,第767页;第1937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书并潘秉钧复归缘由折》,第793页;第1890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览〈御选唐诗〉六本折》,第779页。

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161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御选唐诗〉已刻完折》,第865页。标点略有改动。

⑤康熙五十四年《月令辑要》刻成后亦经过南书房翰林蒋廷锡等人校对,他们的意见先呈报康熙帝,再予修改(《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539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南书房翰林具奏之篇子一篇折》,第990页;第2558号《李国屏奏进〈月令辑要〉一本折》,第996页)。

南书房将校对好的“宋金诗”交给王景曾刊刻，同时，主持纂选的张豫章又将纂成的“元诗”六十本进览，康熙帝再发下南书房校对①。至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全书纂成②，校刊仍在继续。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王景曾进“宋诗”刻本四套，康熙帝俱交南书房校对。至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全书刊成③。

在此模式下，书馆每纂成一部分即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或发下武英殿刊刻，或发下南书房校对后交臣工刊刻，刻成的书样仍及时进览，再经南书房校对后陆续汇成全书。

康熙帝在御定书籍编刊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王文欣已有所揭示④，笔者另有两点补充：一是在形式方面，各书样式须经康熙帝裁定后再正式发刻。如陈邦彦进呈《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刻书样本后奉旨“照第二号刊刻”⑤；和素请旨《月令广义》等书“照何样子刊刻之处，圣裁后再恭谨刊刻”⑥。若书籍样式不合规范，则需承刊者修改，《御制诗第三集》刻样进呈后，康熙帝指出其字体与已刊之御制诗集“长短不同，字之大小参差不一”⑦，承刊者李煦遂迅速改正。二是在内容方面，康熙帝对不同书籍的审阅存在显著差异。武英殿所刊之书多经康熙帝细致校对，被视作是其“一字一句裁定”之书（见表 1）；而臣工承刊之书虽亦须进呈御览，但具体内容实由南书房校对，如前文所述的《渊鉴类函》《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均属此例。此外，李煦承刊《御制诗第三集》时，“先完第一卷第二卷，进呈刻本，蒙发南书房校对后，奉旨交与李煦收拾”⑧；《万寿盛典初集》则由万寿馆“共缮草本一百二十卷，先后进呈御览，奉旨发南书房校正，随付郎中臣赵之垣刊刻”⑨。此类臣工刻书通常被视为由康熙帝“亲加裁定”

---

①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253、279 页。

②顾嗣立：《闾丘诗集》卷二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66 册，第 341 页。

③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403、439 页。

④王文欣：《由〈匏庐公日记〉看康熙朝中后期的钦定书纂刻事业》，《文献》2023 年第 1 期，第 162—167 页。

⑤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 1 册，第 203 页。

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420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进〈诗韵〉十部等情折》，第 949 页。标点略有改动。

⑦《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6 册，第 450 页。

⑧《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6 册，第 880 页。

⑨王奕清：康熙五十五年四月初十日折，王原祁等：《万寿盛典初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3 册，第 14 页。

(见表 2),与武英殿所刻之书存在明显区别。

表 1　武英殿刻书御定情况表

书名	康熙御定情况
古文渊鉴	“每篇奏御,必亲加评骘,指示瑕瑜。”①
翻译资治通鉴纲目	“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闲,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迄今三年有余,全集告竣。”②
御制清文鉴	“朕亲御丹黄,逐一审订。”③
佩文韵府	“每卷每帙,排日进呈;一字一句,遵旨定夺。”④
御选唐诗	“朕亲加考订,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⑤
御纂朱子全书	“皇上崇重朱子之书,至于亲加勘对,一点一画皆经御笔批出。”⑥“皇上躬自校对《朱子全书》,风雨不辍,一字一读,悉费圣心。”⑦
御纂周易折中	“自开局以迄成书,逐句进呈,无一字一句不经圣明酌定者。”⑧
月令辑要	“爰命儒臣重加编辑,次第呈览,亲为裁定。”⑨
御制律历渊源	“乙夜披阅,不辍寒暑,一字一句裁定,悉出圣心,数十年来始能汇辑成书。”⑩

①徐乾学:《憺园文集》卷十九《御选古文渊鉴后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2 册,第 552 页。

②《圣祖实录》卷一五〇“康熙三十年二月”,《清实录》第 5 册,第 666 页。

③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三一,第 609 页。

④查慎行:《敬业堂文集》卷一《武英书局报竣奏折》,查慎行著,范道济点校:《查慎行全集》第 7 册,第 33 页。

⑤玄烨:《御选唐诗序》,陈廷敬等编:《御选唐诗》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46 册,第 1 页。

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5 册,第 330 页。

⑦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二九《覆乐律数表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60 册,第 410 页。

⑧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二九《御制周易折中序文发示恭谢札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60 册,第 421—422 页。

⑨玄烨:《御制月令辑要序》,李光地等编:《御定月令辑要》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67 册,第 39 页。

⑩胤禛等:《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四九上《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江南安徽巡抚臣魏廷珍谨奏为恭谢天恩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22 册,第 537 页。

表 2　臣工刻书御定情况表

书名	承刊者	康熙御定情况
御定历代赋汇	陈元龙	“命词臣考稽古昔,搜采缺逸,都为一集,亲加鉴定。”①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	陈邦彦	“陈邦彦……缮本呈览,朕嘉其用意之勤,命授工锲梓。”②
御定全唐诗录	徐倬	“上览而嘉之,以其勘订精审,赐金授梓。”③
佩文斋咏物诗选	高舆	“屡经乙夜之亲裁,申命诸臣而汇辑。”④
佩文斋书画谱	宋骏业	“伏蒙圣训指示,酌定凡例,编校成书。”⑤
渊鉴类函	高舆	“经重瞳之御览,日丽云昭,帝锡嘉名,便觉光腾万卷。”⑥
御选历代诗余	王奕清	“乃命词臣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为若干卷,而朕亲裁定焉。”⑦
词谱	王奕清	“既命儒臣先辑《历代诗余》,亲加裁定,复命校勘《词谱》一编。”⑧
御定历代纪事年表	马豫	“代远文繁,亲加裁定。”⑨

①玄烨:《御制历代赋汇序》,陈元龙编:《御定历代赋汇》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19 册,第 2 页。

②玄烨:《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序》,陈邦彦等编:《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35 册,第 1 页。

③张玉书:《御定全唐诗录后序》,徐倬辑:《御定全唐诗录》卷末,叶二。

④高舆:《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告成进呈表》,张玉书、汪霦等编:《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32 册,第 3 页。

⑤《凡例》,孙岳颁等:《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9 册,第 3 页。

⑥张英等:《进呈类函表》,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82 册,第 3—4 页。

⑦玄烨:《御制选历代诗余序》,沈辰垣等编:《御选历代诗余》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1 册,第 2 页。

⑧玄烨:《御制词谱序》,王奕清等辑:《御定词谱》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95 册,第 1 页。

⑨玄烨:《御制历代纪事年表序》,王之枢等:《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7 册,第 1 页。

(三)成书告竣阶段

1. 颁赐御序

御定各书在编纂或刊刻告竣之际,例由臣下请旨求序。康熙三十年《翻译资治通鉴纲目》纂成时即由儒臣请序;康熙四十五年《全唐诗》即将刻成之时,曹寅与众翰林共同求序,康熙帝朱批"序文完时,即打发去"①。御制序文多有臣下拟稿的情况,如《御定全唐诗录》《御定历代赋汇》《佩文斋咏物诗选》《御选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御制序均为陈廷敬及王鸿绪所拟,王文欣对此已有考证②。然各书序文并非悉由臣下代拟,《御纂朱子全书》《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的序文即为康熙帝亲撰,并特示李光地阅看③;康熙六十一年《御制律历渊源》告成后,何宗国等请旨颁序,康熙帝称"朕作此序文,不须别为结构,只实述其道理,自然成文"④,可知康熙帝曾为此书亲撰序文。

御制序的书写亦有康熙帝亲书与臣下代笔之别。《佩文韵府》《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御选唐诗》《御纂朱子全书》⑤、《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等书序均为康熙帝御笔所书,落款处均钤"体元主人""万几余暇"两方印,此六篇书序的御笔手迹,还被收入乾隆间编纂的《石渠宝笈》⑥中。亦有部分御制序文为臣下奉敕所书,如《历代纪事年表》《词谱》《康熙字典》《分类字锦》的御制序均署"陈邦彦奉敕敬书"。

从御制序的颁赐情况来看,凡由康熙帝亲撰或亲书的序文,其书内容多经康熙帝亲自校阅(见表 1),足见其对御定书籍内容的实质性审定。

2. 进呈表文

御定书籍编纂完成后,例由总裁官撰写进表上呈康熙帝,以示告竣,

---

①《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 册,第 390 页。

②王文欣:《由〈匏庐公日记〉看康熙朝中后期的钦定书纂刻事业》,《文献》2023 年第 1 期,第 164—165 页。

③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三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60 册,第 420—422 页。

④允禄等:《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首《上谕奏议一》,《故宫珍本丛刊》第 25 册,第 211 页。

⑤《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143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写完〈御选唐诗〉〈序〉五篇折》,第 860 页;第 2157 号《康熙帝谕将〈记〉一篇作速刊刻》,第 864 页;第 2136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御选唐诗〉序文写行书双钩字折》,第 858 页;第 2434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众臣盛赞御纂〈朱子全书〉之〈序〉等情折》,第 953 页。

⑥张照等编:《石渠宝笈·贮乾清宫》,《故宫珍本丛刊》第 438 册,第 40—41 页。

表文内容主要为书籍成书始末及对皇帝的颂扬之辞。

3. 开列职名

康熙朝御定书籍卷前职官衔名的刊载规则十分严格,名单须由臣下草拟进呈,获康熙帝御批后方可正式刊刻。康熙四十五年校刊《全唐诗》时,曹寅专门与众翰林"列衔具公本叩求"①。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对职名的刊载制度作出重要规范,他在翻阅高舆承刊的《佩文斋咏物诗选》时发现卷首只有刻书人名,而编纂诸臣未被列名,由此下旨要求"将纂修、缮写诸大臣、翰林、举贡生监人员衔名,无论革职、已故者,通行分单列名,及监造人员衔名,一并具奏,补入诸书之前"②。此谕发出后,合力修成的御定书籍大多详载参与者衔名。康熙五十年十月,康熙帝在《佩文韵府》效力者名单中"御笔钩去赵晋、何焯二人。自京江相国而下,无论存殁,凡在编纂之列者,着一一另开"③,"京江相国"即指张玉书,康熙五十年卒。《佩文韵府》所列职名十分详细,可谓规范化的代表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佩文斋咏物诗选》与高舆承刊的《渊鉴类函》卷首均阙载校刊者衔名,应是高舆受责后的谨慎之举。

4. 议叙人员

康熙朝的修书议叙规格因书籍性质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关系重大之书如《实录》等,参与者所获奖叙尤厚。康熙十一年《世祖章皇帝实录》告成后,监修、总裁官加"宫保"衔,副总裁、纂修、誊录等官各加一级,监生以通判用,生员以州同先用;康熙四十九年《平定朔漠方略》告成后,监修、总裁加二级,副总裁以下各官加一级,誊录监生等需经考职后再加录用④,其规格较《实录》稍次之。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帝特别提出对"南巡钦取效力人员"加恩议叙⑤,翰林院遂制定了针对修书士人的议叙制度:

> 由翰林院议奏:勤者加一级即行录用,凡惰者暂免议叙,交另修书处效力。任绩平常候补州同之监生潘秉钧等数人,皆照内官学教习之例,凡满六年者,即补知县,年未满者交另修书处效力,待年满

①《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第389页。

②《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159—161页。

③查慎行:《敬业堂文集》卷一《武英书局报竣奏折》,查慎行著,范道济点校:《查慎行全集》第7册,第37页。

④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大清会典》第7册,第6079页。

⑤《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160页。

时，即补知县。①

依此制度，康熙五十三年《御选唐诗》成书后，参与纂修的十一位候缺者俱议叙为知县，候补州同的贡生郭元釪则获“一俟知县缺出即任用”的待遇，因其承刊《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而加一级②。至康熙五十七年《皇舆全览》书成后，改为修书人员未满六年者均须补足年份再行议叙；康熙六十一年，因“修算书处甚严”，该馆修书人员被分为三等议叙③。随着康熙后期开馆数量增多，大量士人借此获得仕进机会，入馆修书遂成为促进底层人才晋升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康熙朝相关议叙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凸显出士人阶层在御定书籍编纂中的重要作用。

御定各书经过上述三个阶段（见图 1）后，基本完成了全部的编刊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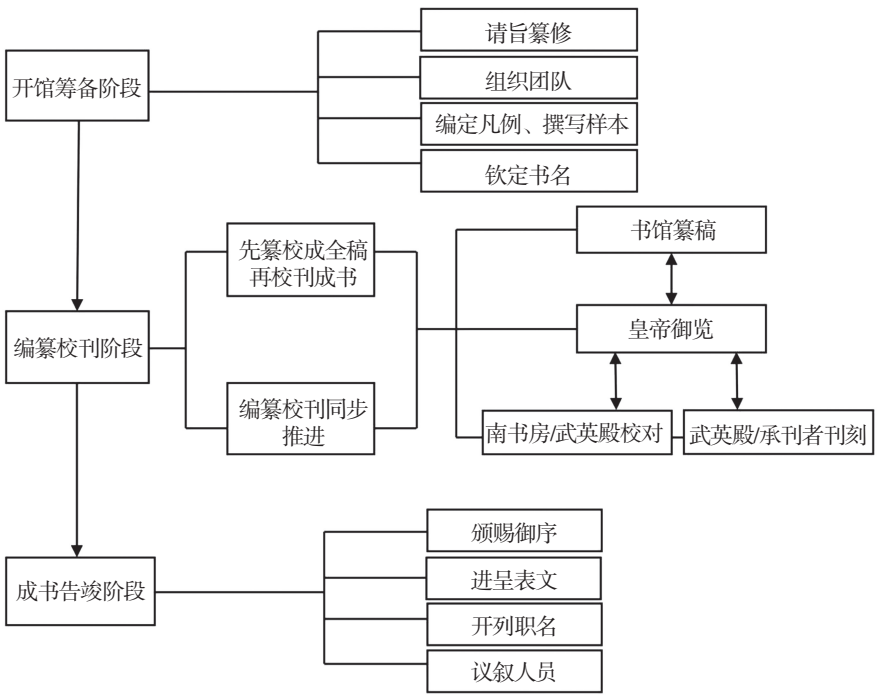


图 1　康熙朝御定书籍编刊流程图

①《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941 号《奏报议叙编纂佩文韵府人员勤惰片》，第 794 页。标点略有改动。

②《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398 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吏部核查考州同之档无郭元釪之名折》，第 943 页。

③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大清会典》第 7 册，第 6079—6080 页。

作。康熙帝还谕令刷印多部，以备御览、陈设或赏赐之用，如《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选唐诗》在刻成后均奉旨刷一千部①。总之，御定诸书从开馆纂修到刊印成书，大小事务悉由康熙帝亲加裁断，充分彰显其对御定书籍编刊流程的全面掌控。

结论

综上所述，康熙一朝编纂了102种御定书籍，纂修地点分为内廷与宫外两种情况。成书过程包括开馆筹备、编纂校刊及成书告竣三个阶段，即各书开纂前先由臣工奏请旨意、组织团队并编定凡例、样本；经康熙帝准允并钦定书名后，采取先纂校成全稿再行校刊，或编纂校刊同步推进的方式陆续成书；最后经皇帝赐序、臣下进表等程序，全书告竣，随即议叙与事人员。康熙帝始终亲自裁定各项事务，尤其重视书籍的校对。整体来看，凡由康熙帝亲率翰林校对之书，均设馆于内廷或委派李光地承修，书成后统交武英殿刊刻，御制序文亦由康熙帝亲撰或亲书；而臣工承刊之书或在宫外设馆编纂，或据内廷已成之稿校刊，书稿仍须进呈康熙帝御览，但审校工作主要由南书房负责，御制序多为臣工代拟代书。相对而言，武英殿所刻之书规格更高，审校程序更为严格，彰显其作为御用书局的特殊地位。

通过考察康熙朝御定书籍的编刊机制，得到三点启示：其一，关于武英殿的机构历史，康熙早期内廷编书活动多集中于南书房，而非武英殿。就现有文献来看，康熙早期翰林入值武英殿编书的记载近乎空白，因此，康熙十九年武英殿设立造办处之时，可能并未同时承担编书职能。武英殿修书处的成立历史由此有重新梳理的空间。其二，关于南书房和武英殿的审校职责，武英殿仅负责其所刊刻之书的校对，其所刊之书仍需由南书房覆校方告完竣，如《御选唐诗》《月令辑要》均是如此；南书房则统筹校对所有御定书籍，并对各书的内容质量起最终把关之责，其在御定书籍成书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其三，关于武英殿的刻书能力，以往研究多认为康熙间武英殿刻书能力有限，本文分析表明，康熙间武英殿所刊之书多为康熙帝亲自校阅者，书稿进呈发下程序繁复且严格，成书周期漫长，如《佩文韵府》历时七年方成。因此，康熙间武英殿刻书数量相较于臣工承

①《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802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922号《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请〈御选唐诗〉印刷多少部折》，第789页。

刊之书偏少,并非武英殿刻书能力不足,而是御前校阅与进呈发下程序复杂所致。总而言之,康熙朝御定书籍的成书并非“一刊而就”,而是编、校、刊层层衔接的复杂过程。以往单纯从“刻书”视角考察清代内府书籍出版史的研究方法,仍有进一步审视的必要。

康熙朝御定书籍编刊活动开创了一种大规模的官方知识生产方式,是康熙帝“稽古右文”政策的集中展现。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正是继承此文治政策①,将清代内府修书事业推向顶峰。康熙朝御定书籍编刊活动,不仅为此后清代官方修书事业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与制度经验,更深刻影响着有清一代文化政策的走向,可谓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治实践。

【作者简介】杨国彭,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清代内府文献。

①弘历御制诗《重华宫茶宴内廷大臣翰林等题四库全书荟要联句并成二律》中有“稽古右文缅祖训”之句(《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六五,《故宫珍本丛刊》第 562 册,第 204—205 页)。